

人文译丛 总主编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朱里安·本达 / 著 孙传钊 / 译

Der Verrat der Intellek- tuellen



人文译丛 总主编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朱里安·本达 / 著 孙传钊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Der

Verrat der Intellek- tuell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的背叛/(法)本达著;孙传钊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

(人文译丛)

ISBN 7-206-04399-2

I. 知… II. ①本… ②孙… III. 知识分子—道德—研究—西方国家

IV. D75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784 号

Julien Banda

Der Verrat der Intellektuellen

知识分子的背叛

著 者:[法]朱利安·本达 译者:孙传钊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张亚力 责任校对:叶 高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 刷:农安县印刷制版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8.375 字 数:2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399-2/B·164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6.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憚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世界为缺乏那种超越真实的信仰而苦恼。

——莱努维尔

出版说明

自 90 年代中学术界提倡人文关怀、陈寅恪热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是读书界关心的话题。这几年译介、出版的西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著作不少，这类著作大多都要提及 20 世纪的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著——1927 年初版的朱利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本达把知识分子规定为古代宗教中的圣职者（clerc），也就是那种脱离世俗社会，追求形而上的学问，追求终极的真理的圣职者，从更广义的词义的来看，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预言家”。在他看来，近代，特别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欧洲传统的文化、伦理在物质文明的冲击下渐趋衰微，随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物力论及形形色色思潮的日益高涨，欧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在世俗社会中完全了抛弃他们那种对真实、真理与正义追求的责任感，分外狂热地为各种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奋斗，背叛了知识分子本身的职责。他厌恶知识分子热中于流行、结社、运动、谎言和非正义、非理性各种的行为。被称为具有“刀笔之才”而擅长文艺批评的本达的广证博引、论证严密、言语犀利的文风，让许多论敌望风披靡。此书出版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已经羽毛丰满，虽然德国纳粹主义还未成气候，但是，本达已经预言欧洲将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重大危机。随着时局的发展，这部著作日益受到欢迎，1939 年，二战爆发那年，重印达 39 次，广为流传，为欧洲当年最畅销书之一。战后，1946 年、1958 年和 1975 年在法国此书又数度再版，分别被翻

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文字。本达为 1946 年再版写了一篇精彩的新版的前言。

本达从理性至上的唯理主义出发，要求知识分子始终不渝地追求真实和终极真理，但是现实生活，已经不能容忍一个纯粹理性的人、一个抽象化的人，所以，本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陷于难以自圆其说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本达也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这样圣职者——知识分子滋养的土壤。但是，他认为今天如果面临法西斯主义等邪恶势力的挑战，知识分子仍应该出来坚持理性，捍卫正义和真实。齐格蒙·鲍曼把这本书称做知识分子的宣言；赛义德说本达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形象：“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不过，由于无论是本达还是序言的作者，都因为他们的西方背景的局限性，使本书带有许多的偏见和局限性，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曲解和误会，使其略失公允。但是，因为这些文字是全书论述整体的有机部分，我们未作修正，只是客观地呈现给读者，希望读者了解到，这些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的主张，而并非编者的意图，应该加以正确的判断和取舍。

安德烈·洛夫的序^①

《知识分子的背叛》有再版的必要吗？本达 1924 年开始执笔，1927 年此书才付梓，历 3 年之久。1946 年得以再版，朱利安·本达特意写了重要的新前言。1958 年出版了第 3 版，附了雷纳·爱迪安勃尔的序；以后 1965 年又再版了一次，即出了第 4 版，其中有删节，就是让·耶克·鲍威尔社版，现在已经很难觅到原书。

1927 年本达发出的警告，站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的人们看来，那论据是不充分的。1975 年，我们回过头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重读的话，此书作为一种奇特的预言一般呈现在眼前。本达强调的是普遍的事物，因此，这样的观点能够经得起时代与历史的双重的检验。1927 年以来突发的各种事件增强了他的关于“人类精神的永恒性”的观点的依据，使得他当年的分析再度显得格外的清晰。在这个序言中，我将要涉及最近的一些历史事实。将言及的这些事实作为例证，来说明这部著作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也不过分。

朱利安·本达是个反潮流者。他逆时代潮流而动，强烈地、热情地、果敢地提倡普遍的价值。今天，作为他的主要著作、作为经典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又一次再版。这部书与他的其他极其抽象的著作一样，值得人们愉悦地饶有兴味地阅读，而且，具有让人一再重读的魅力。我想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出色的自传。

执笔这序的笔者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哲学家，读者也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此书这次再版之际，有一位科学家得到朱利安·本达的

夫人充满情意的嘱托，把写序的任务交给我，几经婉辞，盛情难却。这位科学家也是个书痴书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他也是位当时处于颠峰时期的《新法兰西评论》的热心支持者。从该杂志创刊起，他一直赞赏本达，阅读、关注本达的论文与著作。

两次大战之间，由于作家的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那样的文艺思潮大流行，像火花一样点燃、照亮了文学的上空，那是一个辉煌的年代。然而，在这样多彩的年代，朱利安·本达却进行着他那严厉的说教。这样过分严厉，也会带来使得文学变得萧条的危险。当然，当遇到作家只是凭借其灵感与想象力的时候，再做些严格的挑剔也未尝不可。但是，往昔也好，而今也好，总有些作家和哲学家背离了理性的严格要求，自称是作为科学家的行为，背叛了他们本来的使命。成为朱利安·本达批评的目标的、成为他批评的牺牲品的，就是这些人。

笔者采用的是违背常规的书评写法，所以，这篇序的大半是剖析本达的著作，似乎也作了些特别的分析，却毫无惊人之处。读者所深感兴趣的是本达的观点，而不是介绍这部著作的人。这序（笔者所谓的分析），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也是因为没有背叛本达，得益于他的思想，而且也因为屡屡受益于从他那难以阐释的书中的内容。虽然不是全部，我都一一用引号标出。

在这里我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一部精彩的著作，本达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所以，我的名字竟与本达一起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对于这样不妥的做法，内心充满了不安和踌躇。

现代世界，把理想作为绝对的东西加以护持的知识分子、纯粹的沉思者的存在，是大有必要的。这样的理想，必须由知识分子把它从混沌世界中分离出来，划定于一种境界之中，并加以定义。所谓无秩序，其一部分是从价值观的混乱、从价值的定义自身使得价

值僵化起来乃至使得价值丧失那种奇特的信念造成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诉说普遍的价值，可是不少颂扬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却背叛了自身的职责。所谓知识分子的背叛，就是说他们拒绝普遍的价值，使精神的东西屈从于现世的东西。

知识分子与知性的价值^②

朱利安·本达定义中的所谓知识分子，“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即追求达到获得超越的善那种愉悦的人类的某个阶层”。

知性的主要价值，就是正义、真实与理性。这样知性的价值具有三种特性。即静止的、超越的和理性的。实际上，这三种特征是超越了状况、时代和场所的多样性，各自又是相似的东西。概括地说，是处在现实的外部。那是抽象的、概念的价值，而且是与人的意识是不可分的。

正义、真实与理性，只要不是将实际目的作为目标，就具有知性的价值。理性是批判和理解的根本。如果，为了世俗利益而被使用的话，那么，这事物已经没有知性的价值了。真实其本身就是善，与一切其他的目的没有关系。本达的思想源泉，来自于柏拉图（静止与运动在希腊的对立）和斯宾诺莎（真实是追求纯粹的知性感到喜悦的源泉，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应该受到尊重的是：真实，对其带来的结果丝毫不加以考虑。艺术活动，其本质是超越的，和科学一样，不仅和人类的物质是无缘的，和道德的善的探索本来也是无缘的。这也就是知性的价值。

这样的价值中，那些不是根据理性的、而是依据情感的狂热、勇气、信仰和人际的爱等都是被排除出去的。“基督教中，只要谴责‘生的奢侈’的罪过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这样谴责，将会有不知道多少倍以上的恶行发生。”

对待这个论点时，本达遇见了阿维洛埃斯（Averroes，阿拉伯的哲学家，1126年—1198年。——译者）。他们认为：“基于期待报酬和恐惧惩罚的道德与人、都是与神不相应的，那是反道德的”。

从上面所见，知性的价值是受限制的，是受约束的。因此，当一名知识分子是一种理想。从斯多葛哲学到斯宾诺莎哲学都是从这个理想、从定义出发的实践，是面向某些贤者提出的要求。也许还不能够达到知识分子的身份，但是，这样的实践必然应该是接近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尝试。

知性的价值与国家

如果国家专门基于知性的价值，国家的建设就变得不可能了，国家也不能够维持下去了。这是极其明白的事情。

“在所谓知性的真实的宗教名义下，想要处理各种各样人事，是一种宗教的神格化，即选择的不是人间的事情”。

国家只能够在现实主义中存在下去。当然，国家领袖们常常采用现实主义。但是，过去，他们并不尊重现实主义，而且并不强调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是道德的。马基雅维利是这么宣传的：比如邪恶，即使为政治服务的时候，也仍是恶。马基雅维利是现实政治的理论家，劝说人们同意只是把知性作为一种借口来使用，他们让人接受的政治秘诀是把邪恶也看作一种知性的善的见解。这一秘诀经常被人们使用着，《知识分子的背叛》刚出版时（1927年），那个时代盛行的这种秘诀，既是对普遍价值表示敬意，又对普遍价值表示侮辱的一种秘诀。

如果理所当然地考虑这些所有的要素，就不能不确实承认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走向没落。那是为什么呢？就像朱利安·本达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灭亡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出现值得人们爱的国家，而且，与今天相比，知识分子也容易去追求精神世界。

事实上，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要超越各个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问题，阶级的对立、意识形态的斗争等等，是非常困难的。现代世界，要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与作为一个与知识分子头衔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也是应该是一个服从所有的义务与责任的市民。很多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了政治的热情之中去了。这种所谓的热情“在利害与自尊心的名义下，使得他人相互对立的热情，还要从这对立出发制造阶级的对立与国家的对立两个最大典型的对立。”很多形式知识分子为了故乡与祖国的利益，牺牲了其原来崇拜的普遍的价值，更加极端的例子，他们或无视普遍的价值，或干脆完全忘记了这种价值。某些人或表明无视正义与道德，或声明在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国家的观点以后才顾及正义与道德。比如，先从政治的观点来考虑，如果从政治标准被认为是好的事物，才可以承认那是善的。某些国家，国家的基本法规成了宗教信仰的规范。就连与任何政治目的没有关系的事情，战争也会被颂扬，好战的精神也会得到辩护。基督教也被赞扬成“只是一种实施出色的、适合伟大的人类社会创立的、建设的、实际的道德学校”。莫里斯·巴雷斯这么声称：“无论怎样自豪的人，只能够考虑阶级的正义。”极左派或极右派，在蔑视普遍的价值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这对于他们的活动家来说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普遍的信仰，是相对于人类精神的基督教的遗产。在本达执笔此书的时候，现代知识分子的说教，即“日耳曼价值”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这价值也为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所采用。这种说教不仅标志着希腊主义的破产和普遍事物的终结，也导致了涌现出强烈的征服、统治和强制的欲望，把自己看作特殊的、高于其他民族的优越种族思潮的不断发展，乃至产生不可避免的、直接的结果。还有，只要是把自己看作是理性与真实的唯一的拥有者的话，也会导致出促进政党政治发展的结果。

还是重复这么一句话，尊重知识分子的理性的国家将遭受亡国

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本达完全有先见之明。他说：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信仰统治世俗世界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信仰的说教，或者知识分子委身于实际的热情，一点也不知羞耻，假如赤裸裸地，并且一点点也不想超越政治世俗的热情上升到另一境界，那样的状况，远比知识分子的信仰统治世俗世界应该感到可怕。”

知识分子与国家

如果假设知识分子只是在文明的国家的体系里，那么只有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普遍的价值的发展才有可能。人们非常反对本达要把永远的价值和冥想作为一种职责交给知识分子，没有再比这种指责更加错误的了。《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是这么明确地表述的：“知识分子，即使继续作为知识分子，为了在向这个堕落的世界导入神圣的价值，确实可以下降到那个世界”……“知识分子甘心情愿接受相对的东西，能够获得何种程度的人性呢”。……本达继续说：“但是，这种世俗的人们的边上，必须有知识分子、纯粹的思想家在那里。后者正是绝对地守护理想，当理想走向现实的时候，以拒绝接受那种当然要接受的被歪曲形态而告终。我想，教会的传教士或那种听取赎罪坦白的神甫的边上，也必须有写作《基督教须知》的孤独者”。

现代却不喜欢冥想家，只尊重行动家。知识分子将取何种立场呢？本达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

“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但是，对左翼的政治也必然有不同意的东西。涉足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向人们诉说正义与真实。”

（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的功能，是强化权力、效率和秩序等及其价值、追求国家的利益。这些与精神世界的力量是不同的东

西。

“精神的功能是为了接受其本身原有的价值、坚持这样立场的最终结果——精神驱动着理性对国家事务置喙的结果，精神将必然遭到国家的镇压。对精神的压迫，国家从自己的立场来说这是自卫，所以，对以逻辑为根基的精神发出的愤慨当然感到吃惊，但是，相反，精神成为国家的奴婢应该远远叫人吃惊。”

朱利安·本达的推论是从逻辑出发的，也是现实的。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荣誉和强大，正是他们对静止的、超越的、理性的及普遍的价值崇拜。“知识分子只有在对人们宣称自己的王国不属于世俗的现世的时候才是强有力的……”，所以知识分子学说的影响力与其不具有实际价值没有关系。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以向世俗的人们叙述使他们不快的真实，使自己内心不至于陷入悔恨作为代价的。“知识分子背着十字架，他们的教诲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叙说普遍的价值。蔑视这种价值、全力以赴颂扬大众的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背叛了自身的职责，使精神的东西隶属于现世的东西的知识分子是背叛他们自身的职责。

科学与道德

所谓科学，是基于理性的作用、基于真理的探究的活动。这在不超越其目的的条件下，成为知性的价值。朱利安·本达是这么说的：“我把精神丰富地预测现实叫做思维”（《关于观念的类型》）。

“所谓思考，是强调精神，是活动。思维的精神是对外部的反应。”……“不思考或者只是稍作思考的人们，不能够对外部的给予作出贴切的反应而接受外来的影响。”

近代的人类，他们的大多数是接受这种影响。科学成了思维的学校。

“科学所依赖的方法是有教育价值的，但是，那是不断验证、不断探索、不断地纠正错误并且加强对感情的诱惑作持续斗争的结果。……科学活动几乎都是与社会目的没有关系的活动，所以是孕育超越性的学校。而且，正是从这出发才形成了高尚的道德价值”。

科学的方法和理性的运动一起展开，来促进对真理的探索。“但是，在这中间不具有为创造正义的任何权能。那是因为这样的创造不过是道德意志的结果。”即这所谓道德意志是不具有任何科学的成分的。“作为那样的科学家，没有解决关于人类善的问题的资格。”本达的老师莱努维尔是这么认为的：关于善的探索应该与科学，与艺术都是无缘的。

伦理学是一门判断善与恶的学问。是在将经验与理性相互对照之下诞生的学问，是概念与问题综合化的结果。善是显示道德要求，美是显示艺术的价值，而真实显示的是科学活动的价值。真实与善是不能够混淆的，与没有说教的艺术一样，也当然不存在科学伦理学或学术伦理学。因此，本达认为无论怎样高尚的事物，如果为了某种“大义”贡献上学问、乃至背叛学者的职责、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不可宽恕的。

即使如此，实践这样的严格的准则的典型、榜样是不变的（也不是从如具体的成功啊、好结果啊，那样间接的方法来例证、决定的，而是从这实践本身来推论的真实性来例证、决定的）。这种严格的准则，只要清晰地描述了合理与非合理的境界，就能成为范例。只有在这中间，才具有道德的意义。学者寄予社会的善只有根据这样严格的准则去实行。

知识分子与真实

真实是知性的价值。米格尔·德·乌纳姆诺（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西班牙哲学家、诗人。——译者）笔下的某个

人物这么说：“所谓真实的脸，应该是可怕的。因此，对于大众来说，神话与幻想是必要的，而且接受蒙骗也是必要的。真实是某种可怕的、难以忍受的、毁灭的东西”。这样的观点，这样严酷的观点，不仅仅是“大众”持有，知识分子也持这种观点。总之，把真实及探索真实作为神话与神话的庆典、或把思想作为戏剧的写作方法、或把观念的逻辑展开变成漫无边际的梦想，是知识分子；把不是理性主义的东西、把完全是空疏的胡说八道称作秘密的教义并且加以盲目信仰的也是知识分子。

几年前，一位杰出的英国科学家在英国发表批判达尔文观点的文章。他的分析的光芒的照耀下，耶稣会的神甫的许多主张都变得难以成立了。他的推理极其严密，批判也极其贴切。因此，笔者与法国所有的定期发行读物联系要求刊出这论文的译文，都遭到了拒绝。信仰者，把神话看作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他们偶像的倒塌会成为他们自身判断错误的过失。爱梯安勃尔说到本达的时曾经提到“策划着沉默的阴谋的某武装军团”，这个“沉默的阴谋”是组成整个社会的一个要素。本达首当其冲成了牺牲者。人们不能容忍本达指出了柏格森的谬误而且还苛刻地批评这种哲学。柏格森是不能冒犯的。人们当然也不允许他批判某思想家、某教会、某极权主义国家。那么，把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俗称，该大学最初是为贫穷孩子设立的学校。创始人是索邦（L. de Sorbonne）。后变成神学研究中心及教皇之外的最大教权机构。1790年被取缔，校舍为巴黎大学接管。——译者〕著名教授“跳舞的伊斯兰教的僧侣”（参照后面爱迪安勃尔的序言——译者），要从怜悯的情感出发？而解剖同时代人的著作指出其对精神所取的态度的错误，要从礼仪出发？朱利安·本达的严厉、顽固而且无情。他谴责浪漫主义，控诉狂热、流行，揭露虚伪的荣誉，瓦解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话。他的著作（人们也许为之大吃一惊）引起了诸多的憎恨，至今还回响着这种余音。